

XIANZHI DE ZHIHU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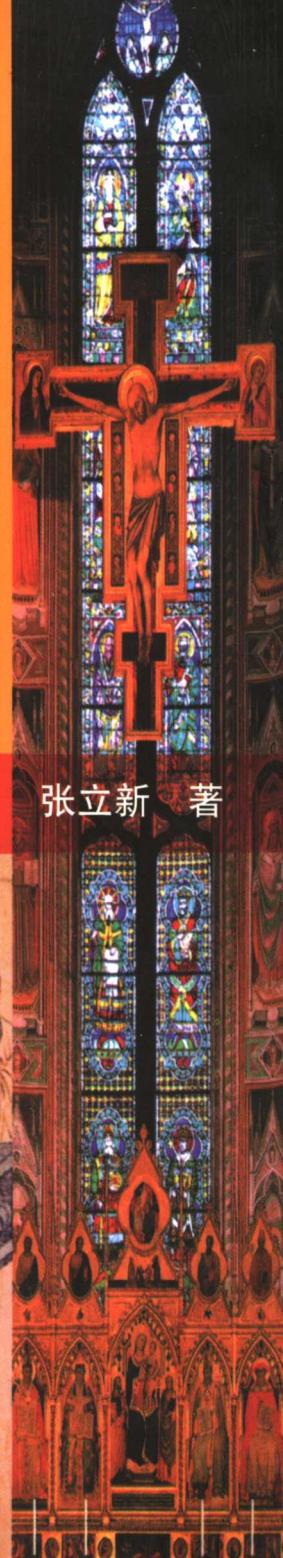
先知的智慧

比较视野下的先秦思想文化精华

张立新 著



学林出版社



B220.5
Z137

XIANZHI DE ZHIHUI

先知的智慧

比较视野下的先秦思想文化精华

张立新 著



SBL17/02



学林出版社

20029947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先知的智慧:比较视野下的先秦思想文化精华/张立新著.—上海:学林出版社,2004.11

ISBN 7-80668-799-8

I. 先... II. 张... III. 哲学思想-研究-中国-先秦时代 IV. B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92243 号

先知的智慧

—比较视野下的先秦思想文化精华



作 者——张立新
责任编辑——刘文祥
封面设计——周剑峰
责任监制——田振军
出 版——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学林出版社(上海钦州南路 81 号)
电话:64515005 传真:64515005
发 行——学林图书在上海发行所
学林图书发行部(钦州南路 81 号 1 楼)
电话:64515012 传真:64844088
印 刷——上海出版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889×1194 1/32
印 张——9
字 数——16 万字
版 次——2004 年 11 月第 1 版
2004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4 000 册
书 号——ISBN 7-80668-799-8/B·39
定 价——22.00 元

目 录

前言：先秦诸子的先知品格 1

一、大道难言 绝圣弃智

——老聃的神秘之思 21

神秘的“道”/绝圣弃智/以柔克刚/善恶之辨

二、倡仁义之学 立君子风范

——孔丘的人道之思 59

坎坷人生/人道与“仁”/君子涵养与领袖风采/
学者情怀

三、尊天立教 兼爱世人

——墨翟的宗教理念 115

伟大的“贱人”/兼爱与尊天/真理握在上帝手中/
人才观、生命激情与和平理想/中绝与否

四、养浩然之气 求至大至刚

——孟轲的豪情壮志 153

千古帝王师？/理想国/“穷”与“达”/浩然之气/
灵魂的守望者

五、水击三千里 何处可逍遥

——庄周的荒诞世界 189

其人其文/《秋水》意趣与“逍遙”之境/《齐物论》的
启示/上帝死了之后

六、长路求索 九死不悔

——屈原的人生境界 229

先知诗人/精神丰碑/灵魂的提升与沉沦

不结束语：全球化语境中诸子文化资源的整合 256

后记 283

前言：先秦诸子的先知品格

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觉后知，使先觉觉后觉。

（《孟子·万章上》）

吾人思中古之最古者

尾随我们，但忽焉在前，

要和我们相遇。

——[德]海德格尔

春秋战国时代是中国文化一个很重要的发展期，先秦诸子提出了传统文化一些最重要的价值观，中华民族最基本的人文精神正由他们所打造，汉语中一些最富有现代意义的词汇，如：仁义、诚信、人道、爱、求索等等，都是他们留给后代的宝贵遗产。对先秦诸子的研究，自古及今，其著作可谓汗牛充栋，但不同时代的人们，由于受特定时代文化视野的局限，对诸子典籍中所蕴含的文化信息的关注和领悟是极不相同的。如果我们把诸子学的接受史按照大

的文化背景作一粗略的划分，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自汉代至晚清的古代诸子学大半属注疏考据之类，加之有儒术独尊的教条，同时缺少世界文化的参照，其视界的狭窄是必然的；“五·四”前后的一批学者，如胡适、林语堂、钱穆等人，虽然他们大多持了反传统的立场（钱穆除外），但由于他们有着相对较为广阔的文化视野，故而能在惊鸿回头之际慧眼独具，于粗疏的论说中见出真知卓识，为先秦诸子的研究拓展了较大的空间；而自上个世纪后半期起大约三四十年的时期内，虽然研究还在深入，也有了较多的研究成果，但频繁的政治运动的干预，使不少学者丧失了学术个性，学术几乎成了特定时期狭隘政治观念的传声筒。故当政治的疾雷颶风过去之后我们回首俯察，才觉到学术的园林中并不像原先所炫耀的那样繁花似锦，老实地讲，它多少让人感觉到一种零乱和荒凉。这一时期诸多的学术流弊中，我以为影响最为恶劣的是那种以划线站队的思维方式给先秦诸子贴阶级标签的做法。

只要略为翻一下这一时期那些影响较大的文、史、哲或思想史著作，几乎无一例外地可看到那种贴上了阶级标签的断语。在这当中，孔子的处境最为尴尬，这个在旧时代被尊为“大成至圣先师”的文化人，被判断为“企图挽救‘日薄西山’的奴隶制，曾周游列国，席不暇暖，对现实采取‘知不可为而为之’的态度”。^[1]他“在这个动荡的变革时代，明确地站在保守、落后的一方”，其思想和行为“都反映了被财富打败、处于没落命运的氏族贵族的特征”。^[2]一言

以蔽之：这是一个思想落后、反动——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家伙，其“知不可为而为之”正可反映他的顽固不化，因为一切反动派都不会心甘情愿地自行退出历史舞台。但也有论者扯着衣襟要把他从那个注定要被打进黑暗地狱的贵族圈子里拉出来，给他贴上一个“新兴地主阶级”的标签。他们为之辩解说：“他的祖先虽是宋国的贵族，他自己却是士阶层中的人物。……作为新兴地主阶级代表的孔子，是要建立封建阶级的新秩序来反对腐朽的奴隶制度，他的思想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具有适应奴隶解放的进步意义的。”^[3]其“思想和行动主要反映了新兴地主阶级的要求”。^[4]这样说，大约是不愿意让孔夫子背上那口“思想反动”的黑锅，但一个“地主阶级的代表”，在一个更新的时代里又有什么荣耀可言呢？只要政治形势需要，照样可以批倒批臭。

相对于孔子来说，庄子的命运似更为不济，他无可争议地被扫进了“没落阶级”的行列中，他的那些充满奇思异想的文章被批判为“反映了一部分没落奴隶主阶级的无可奈何的消极幻想”，他“无疑是一个代表没落奴隶主阶级的哲学家，由于社会的根本变化，庄子的地位无法维持，这就决定他对现实极端不满”。^[5]甚至没有人敢像拉孔子那样拉他一把，大约庄子那种冷眼旁观、洞幽烛微而又放言无忌的神态实在与一个以革命为神圣的时代格格不入。还有墨子，据说他“最能重视下层人民的利益”。那么在一个“劳工神圣”的文化氛围中，他总该受到特别的尊礼了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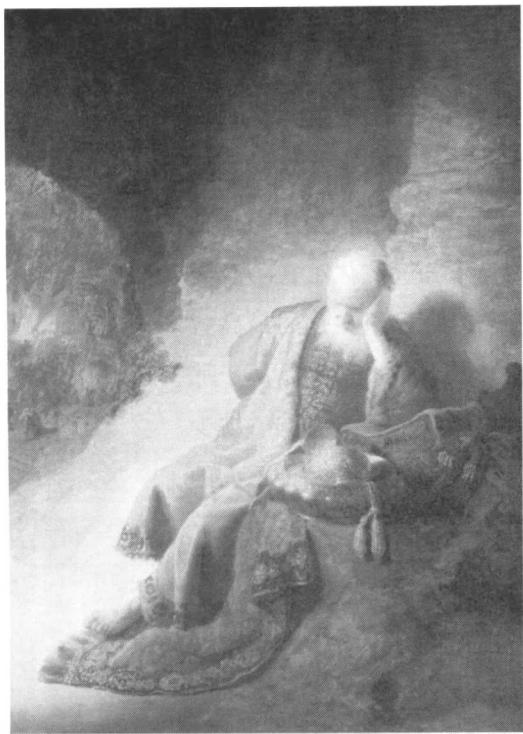
可是不幸他又被判为“小生产劳动者的思想典型”。^[6]这个雅号虽然没有“没落”、“反动”之嫌，似乎不算太难听，但它却与“狭隘”、“空想”之类贬词有了血缘的联系。总之，按照这种思维的逻辑评论下来，真可谓洪洞县里无好人了。

举出上面这些例子，丝毫没有责难前辈学者的意思，因为很少有人能超越他们当时所处的学术环境和那个时代。事实上这些学界前辈很多都是令人敬重的，他们大都达到了那个时代可能达到的高度。我只是想说明，给历史上这些伟大的思想家贴阶级标签是一件多么冒险的事情，这种冒险，并不仅仅表现在定位上存在的难度——如上文提到的关于孔子思想阶级属性定位上存在的严重歧见，更在于这样的定位极容易消解这些文化巨子思想智慧中宝贵的资源，从而不利于当代中国的思想文化建设。

大约从九十年代中期开始，一些研究诸子学的人不仅小心地避开了阶级定位问题（这种情形多少有点类似停止经济领域姓社姓资的争论），同时也尝试着用别的具有普适意义的尺度来评说先秦诸子。比如林庚先生，他称诸子时代是一个“启蒙与智者的时代”，^[7]就显然与早先的研究者大异其趣了。这一转变是意义重大的，它表明我们的研究和评论开始自觉地淡化那种类似于傲慢的“审判官”的角色意识，以诚实的心灵与虔敬的心态正面地与这些古代先哲对话，去感受、理解和吸纳他们的思想智慧。但我不太清楚林庚先生所谓“智者”的内涵，是与古希腊的“智者”相类似还是更接近于启蒙时代的伏尔泰、狄德罗等怀疑论

者,抑或只是一个较宽泛的对于思想者的称谓?在我的阅读感受中,倒更愿意将这一时期的几位文化巨子称为“先知”,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智者”。比如说老聃、孔丘、墨翟、孟轲、庄周、屈原,^[8]他们作为一个思想家的智慧和品格,是同时代的施惠、公孙龙以及商鞅、韩非们所不可比拟的,更不用说张仪、苏秦、李斯之流。正可谓“小智不及大智”,这几个人的思想代表了中华传统思想文化的最高智慧,在人类文明史上具有不朽的价值。他们似乎是属于那样一种人:如果没有他们,一个文明将变得黯然无光;缺少了他们中间任何一个,对这个文明来说都将是一个重大的缺憾。由于有了他们那些奇妙的思想,中华民族在历史上才可以被称为是一个富于智慧的民族。在传统语汇中我找不到更恰当的字眼来表达我对他们的认识,只好借用“先知”(Prophet)这个原本带有宗教色彩的概念。

在犹太圣经中,先知是人之子,又是神的代言人,是神与人的中介,是被神宣召、身负使命的神的使者。摩西受上帝之命带领以色列人以百折不挠的精神走出埃及,去追求自由和幸福,因而他被认为是最伟大的先知;在以色列王国衰落时期,以赛亚、以西结、耶利米等人四处奔走呐喊,呼唤人们要坚定对上帝的信仰,他们为铸造民族的灵魂而身受磨难,他们所进行的社会活动被称为“先知运动”。到后来,人们便把那些具有高尚品质和远见卓识,对人类精神的发展作出重大贡献的文人也称为先知。如但丁、歌德和卢梭等人,就被卡莱尔称为“诗人先知”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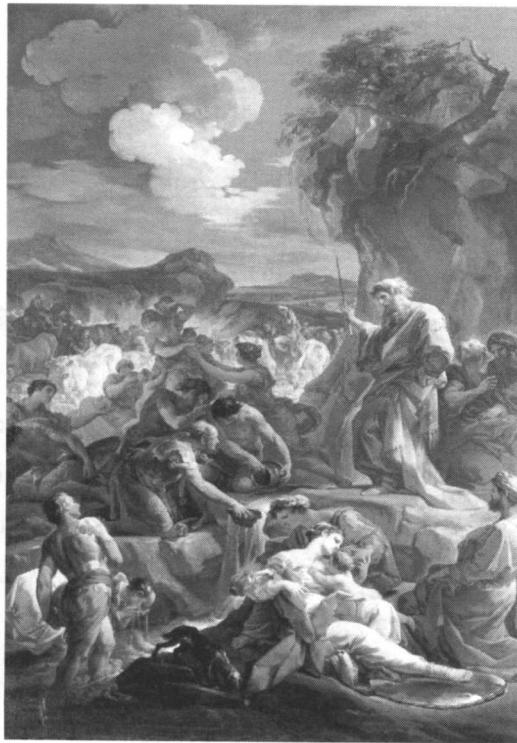
摩西像

“文人先知”。卡莱尔说：“在真正的文人身上有一种被世界承认或不被世界承认的神圣性：他是世界之光，世界的教士；像神圣的火柱在世界黑暗的历程中指引世界经历时间的流逝。”^[9]在中国历史上，孟子是一个曾慨然以先知自命的人。《孟子·万章上》说：“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觉后知，使先觉觉后觉。予，天民之先觉者也。”承担上帝使命的豪情溢于言表。《论语》记载有一个孔

子的仰慕者，在与夫子作了一番长谈之后这样表达他的感受：“天下之无道也久矣，天将以夫子为木铎。”木铎，本义为木舌铃，古代施行政教传布命令时用之，从象征的意义上说，就是文化荒漠里的驼铃，就是精神的向导，就是先知。平心而论，堪称“木铎”或先知的何止孔、孟，上面所提到的这几位中国先秦时代的思想者，其智慧之光烛照千古，其古道热肠的声音呼唤着人类永不放弃理想，去寻求自由、和平与幸福……，他们正是当之无愧的真正伟大的先知。

先知的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品性首先是**诚实**。诚实是一切事业得以成功的基础，也是做人的根本。但是，并非每一个人都能够做到诚实，特别是面临一个荒谬和黑暗的时代，当“世界卧倒在恶者脚下”，人世被虚伪和谎言所塞满，诚实便表现为一种高贵的品质。“谁都可以生活在事物的外表中，但对他来说，生活在事物的事实中，是一种自然的必然性。尽管所有的人只是和宇宙玩游戏，而这种人却认真地对待宇宙。他是一个智者，首先要凭靠真诚”。^[10]正是这种品性，把先知与伪先知区别开来。先知似乎是从上帝那儿获得了神性，面对神秘的宇宙，他有足够的勇气说出他所感知的真实。他知道生活在谎言中是一种罪恶。

似乎没有人怀疑过老、庄的真诚，他们受



摩西带以色列人出埃及，在巴兰旷野漂泊了40年。

到的责难多半是“消极”。但一个人对自己不喜欢的东西为什么不可以消极一点呢？当一个社会“积极”得近乎发狂的情景下，“消极”就需要有一种诚实的勇气。老、庄是最看重真性情的，他们要“全性保真”，要自然而然，要精神自由。楚威王曾以重金聘庄子为相，被他拒绝了，他说：“我宁游戏污渎之中自快，无为有国者所羁。”我们相信这些话是出自一颗诚实的心灵，并非是那种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的牢骚话。似乎也没有人怀疑过墨子的诚实，相反，他被认为是一个具有常人所难以企及的崇高品质的人，这一点连他思想上的反对者也不能不佩服。孟子说他“摩顶放踵，利天下而为之”，庄子称“其生也勤，其死也薄。其道大毅，使人忧，使人悲，其行难为也。……墨子虽能独任，奈天下何”，^[11]可知他是一个埋头苦干的人，人世间的一切虚饰与他无缘。只有孔、孟一派的诚实受到过质疑，有“伪善”之讥，有人说他们的学说是要给社会蒙上“温情脉脉的‘礼’、‘德’面纱”。但要明白，儒学是一种理想主义的学说，正因为他们看到了赤裸裸的恶行败德，才热切呼唤人间的温情，而且在理论上也是儒家最明确地把诚信看成是人立身的根本。“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民无信不立”，这都是人们耳熟能详的话语。我们不可因世间有伪善者便将儒学视为伪善。当孔子平心静气地说“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的时候，当孟子激昂慷慨地宣扬他的大丈夫人格和浩然之气的时候，当屈原痛心疾首地呼喊：“指九天以为正兮，夫为灵修之故也”的时候，我们相信他们内心

的诚实,而不认为是一种“装腔作势”。

一个伟大的先知还必须具有深刻的洞察力。这是一种大智慧,这种智慧使他们和一般意义上的智者或聪明人区别开来。他们所洞察的是歌德所谓“公开的秘密”,即那种向所有人公开,但却几乎没有人能看到的神圣的秘密。这种秘密存在于每一时代、每一地方的每一事物之中,一般人往往视而不见,而先知,似乎就是上帝派来向我们揭示宇宙和人世奥秘的人。他们为那种秘密所吸引,甚至他们的生命,也因这神圣的秘密才有意义。这在犹太或基督教的语境中,或许可称为“上帝的秘密”,在中国,则是天道和人道,是万有中之“真意”。

犹太先知把自己对宇宙、社会、人生以及人自身的思考凝聚在对“上帝”这一意象的解读中,对上帝本质的言说其实就是对宇宙人生的直觉的把握。其实,就文化视野来讲,春秋战国时代的这些中华先知并不比犹太先知狭窄,他们对“上帝的秘密”的知解力也并不逊色,只不过他们言说的方式和用语不同而已。比如说,孔、孟关于“仁”与“义”,墨子关于“兼爱”、“非攻”的言说,都可通往犹太先知所言上帝诫命中的人道主义理念,这些思想断不可用“被财富所打败了的奴隶主贵族的旧梦重温”或“小生产者的乌托邦意识”那样的评说作简单的否定。钱穆先生认为像孔子那样的人,他思考问题并不抱有狭义的民族观念,也不抱狭义的国家观,更没有狭义的社会阶级观念,“他只想行道于天下”。^[12]其实不仅孔子如此,其他先秦诸子中的伟



福音书传道者：四福音书为《新约》重要经卷，分别是《路加福音》、《马太福音》、《马可福音》、《约翰福音》。

呵！然而这就是中华先知们所洞悉与所要做的。再比如老、庄关于“道”的言说，对“道”的神秘性的理解，老子的刚柔之辩、智愚之辩、祸福之辩，庄子相对论中所表达的对宇宙无穷和人的局限的认识，及对文明社会正在摧残、扭曲人的自然本性的敏感与呼告等等，这一切都无不显出了异乎寻常的洞察力。再有那个倡言“尊天”的墨子，胡适曾说他“具有高度的宗教气质”，“也许是中国出现过的最伟大人物”。^[13]对墨子的认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们对宗教的理解，只有对宗教精神有深刻理解的人，才可以融入墨子的视界。墨子的洞见，在于他看到了“信仰”对于社会人生的意义，儒学中那些具有普适意义的美好信念和伦理要求，如果不建筑在信仰的基石上，终将会落空。这种洞见若置换成基督教的语言便是：“若无上帝，则无良善”，“若

大思想家亦然。钱穆称孔子为“人类主义者”或“世界主义者”也许太过褒扬，但孔子们着眼于人的发展及人自身的完善，着眼于社会的良性进步，洞悉到人类获得自由与幸福的必要条件，自是其不同凡响之处。在无爱的荒原中呼唤爱，在血雨腥风中呼唤良知和正义，在陷入疯狂的人群中呼唤理性，这就如在茫茫的戈壁沙漠中独步跋涉去寻找甘泉，那是怎样一种艰难的历程

无上帝，则无正义”。庄子在现实功利之上设置了心灵的自由，警惕着“心为物役”或“心为形役”；孔子在现实功利之上设置了正义，所以有视富贵如浮云之说；墨子要进一步将正义定义为“天志”，天志被预设为存在爱的愿望并且有益于所有的人，天本身保佑所有互爱的人并惩罚所有互相伤害的人。这些话语都让人联想到犹太先知理解意识中那个善良、公正的神明。儒家虽讲天命却认王权为绝对权威，墨子却坚持要在王权之上设置天志。如果说“基督教在独一的上帝面前提高了人的身价，而不论其地位、财产如何”，^[14]那么，墨子想要做的不也就是这件事情吗？林语堂曾说墨子的学说“实在是一个可注意的以‘上帝的父性’及人与人是兄弟关系的教义为基础的苦行及舍己为人的宗教”，^[15]可算是很中肯的评价。很少人能理解墨子，那个聪明绝顶的韩非称墨子的思想是“微妙之言”，“上智之所难知也”。但他又说“糟糠不饱者不务粱肉，短褐不完者不待文绣”，所以他选择了“糟糠”兜售给昏庸短视的国君来作精神的食粮。这当然是文化选择上的一个历史的悲剧。

与诚实的品性和洞察力相关的还有使命感。基督教说是“担当世人的罪债”，中国人说是“铁肩担道义”，是“舍我其谁”的救世情怀。谁都可以在昏乱的现世闭上眼睛、装聋作哑、长睡不醒，但是先知不能；谁都可以放弃做人的原则与世同流，但是先知不能。他偏要在泥塘中淘出清流，在罪恶中呼唤公义，在谎言中道出真相。为此他们视人世的荣华如浮

云，如粪土，他们可以傲视王侯，能够以孑然之身与俗世对立。他们用生命告诉人们：这世界，可以是另一种样子！

在人类文明史上，谁要妄想着扮演上帝以拯救世人，这个人肯定是一头蠢驴，他将在神的笑声中无地可容。但救世的情怀却为一切先知所共有。犹太先知说这是受上帝之命，摩西带以色列出埃及，以西结、以赛亚受感召发预言都莫不如此。中国的先知们也有相类似的人生感受。关于“木铎”之喻，孔子在流浪途中说：“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就纯然是一种先知话语。他说自己的使命就是要来做西周文化薪尽火传的工作，而上帝大约是不会让这种文化毁灭的，所以他无所畏惧。最值得玩味的是孔子在陈、蔡旷野中和弟子的那番对话，那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灵魂的交流与沟通，对话涉及到了人在困境当中是否能守护住自己确认的理想和信念这样一个严肃的课题。学生问先生：“你成天教我们正人君子之道，难道君子就是要这么受苦受难吗？”先生答曰：“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这是一个思想家和伟大先知庄严的人生誓言，落地有声。孔子深切地体会到，一个人的精神境界所达到的高度，只有在逆境之中才能检验出来，而能否在人生的困境中坚守住自己美好的生活信念，正是君子与小人一个重要的分野。如孔子的高足颜回所言：“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虽然，夫子推而行之，不容何病？不容然后见君子！”这些话语同样表现了具有救世情怀的